



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资助



〔 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丛书 〕

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

源于广州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朱竑 主编

刘博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广州市宣传文化出版资金资助

〔 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丛书 〕

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

源于广州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朱竑 主编

刘博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源于广州的多案例比较研究/刘博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2880-3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节日—风俗习惯—对比
研究—广州 IV. ①K8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736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丛书
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
——源于广州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朱竑 主编

刘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880-3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5/8

定价:4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	3
第三节 研究意义	4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7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10
第一节 地方认同建构的文化政治	10
第二节 城市民俗节庆中的地方认同	22
第三节 地方认同的主要研究方法	33
第四节 研究问题	38
第五节 研究设计与方法	40
第三章 广州民俗节庆与案例选择	44
第一节 广州民俗节庆类型	45
第二节 广州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	61
第三节 案例选择与研究过程	62
第四章 广州迎春花市的地方认同建构	67
第一节 迎春花市的形成历史	67
第二节 迎春花市民间合法性基础与认同实践	73
第三节 迎春花市习俗的扩散与变迁	88
第四节 迎春花市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	99

第五节 小结.....	116
第五章 广府庙会的地方认同建构	119
第一节 广府庙会的由来.....	121
第二节 广府庙会合法性争议.....	131
第三节 不同群体参与地方认同建构.....	168
第四节 广府庙会参与者的地方认同.....	206
第五节 小结.....	219
第六章 广州龙舟节的地方认同建构	222
第一节 城市化进程中的广州龙舟节.....	223
第二节 广州龙舟节的地方认同建构.....	235
第三节 小结.....	247
参考文献	249
附录 A 国内外相关研究检索情况	269
附录 B 调研材料	271
附录 C 访谈人员名单与主题	295
后记	30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全球化是当代不同学科学者研究的共同背景。“全球化”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它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空观念巨变联系在一起（萨森，2011）。“全球化”是指文化实践在其中发生的舞台结构与舞台过程（弗里德曼，2004），核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张力（阿帕杜莱，2012）。从理论视角来看，全球化增进了文化交流，强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但是，全球化力量也在不断消解着地方特质，抹杀着地方的独特性，威胁着地方传统文化的生存。由此，地方丧失其独特的意义，成为剥离了文化意义而服务于经济的地方（Auge，1995）。由于面临巨大的冲击，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与其曾经拥有的幸福过去形成巨大的反差，人们常常迷失了自己的生活价值和方向感，无法适应瞬息即逝的社会变化，造成地方文化认同的弱化甚至消失。于是，人们开始追寻地方历史、传统文化、集体记忆等共同话语，期望借助记忆的碎片与现实生活世界进行对比，从而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建构自我的多种身份。在现代性语境下，不同行动者重建遭受全球化冲击的本土文化时，他们既是在不断地变动、重组和更新各个“共同体”的记忆，也是在不断地创建各个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2005）。展示地方特有传统文

化的节庆活动成为地方增强群体凝聚力和塑造地方文化身份的重要策略。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形式、多愁善感的遗产保护行为、对新来者或者局外人的敌对情绪等被激起,他们将地方视为来源于内化了的过去历史的单一的、本质的身份。地方及其独特性固然非常重要,然而正如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 1994a)的“进步的地方感”概念所认为的,地方并非静态的,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地方没有清晰的边界,也并不具有单一的独特的身份,而是充满认同的分异,地方认同时刻处于不断被建构的过程之中。本文试图理解在全球化冲击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地方如何利用民俗节庆以彰显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不同行动者如何争夺文化表征权力,如何影响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体现了谁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因此,为了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地方认同建构过程中的社会权力关系,有必要基于地方建构视角,充分解析不同行动者如何基于自己对地方意义的理解及地方认同,选择何种地方性文化元素建构地方认同,这将有助于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城市节庆与地方认同的关系。

就实践层面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总是处于不断交流、融合与重构之中。“千城一面”的问题非常突出,标准化和商业化抹杀了城市建筑的特色,也削弱了地域文化的特色和多样性,城市文化逐渐趋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导致文化全球化,人们消费着工业化生产带来的同质化产品,抹杀了原有的生活品质和文化传统,挑战人们已有的生活方式;城市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建设或旧城改造导致传统生活空间、生活方式变化,大量的传统街巷、老地名、老建筑和历史街区不断消失,广府人“叹早茶”等休闲惬意的传统生活方式已发生深刻

变迁;与此同时,城市不断吸纳着新移民,广州作为广府文化核心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在此背景下,老广州人非常担心广州人会集体失忆,新移民在融入地方文化时则经历焦虑过程。作为城市管理者 and 经营者的政府也日益发现城市地方性文化元素的重要价值,挖掘独特的地方文化符号以彰显地方特色,建构便于识别的地方形象,从而吸引投资者、新居民与游客,提升原有居民的地方认同,加速外来移民的文化融入。如何衔接多元社会群体对地方过去的记忆、当下的兴趣与对未来的展望成为塑造独特地方认同的关键。总之,不管是政府主导的文化宣传和保护,还是当地民众自下而上发起的文化保卫战,都从不同层面上体现出文化认同缺失之后不同社会群体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捍卫和保护。尽管民俗节庆属于日常生活的非常态插曲,但因其轰动效应和狂欢性质,容易引起人们的广泛参与并留下深刻记忆,甚至唤起人们尘封的文化记忆并形成新的集体记忆,节庆展演本身成为不同行动者建构地方认同的场域,研究城市节庆对促进地方认同意义重大。

第二节 研究目的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导致认同危机背景下,本文将基于现象学的人文地理学质性研究方法与基于环境心理学的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探讨不同类型城市民俗节庆建构地方认同过程中的社会权力关系。主要从民俗节庆的地方性入手,考虑不同行动者如何基于自身的地方文化认同,利用自身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采取何种策略来建构自己的地方认同。本书首先全面介绍广州市较有影响力的民俗节庆活动。然后,重点选择三个案例进行分析,第一个是

经历史传承而来的、与本地花卉种植和日常消费的文化记忆和生活实践均密切相关的迎春花市,第二个是整合广府概念、具体选择地方性文化元素打造地方节庆品牌而新创的广府庙会,第三个是以端午节龙舟竞渡为文化基础的广州龙舟节。探讨在这三类城市民俗节庆情境下不同行动者地方文化身份再生产与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以期深入理解城市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的关系。

第三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研究者重新将“地方”引入了人文地理学研究(Tuan, 1975),地方认同即受到地理学者的持续关注(Proshansky, 1978),与其相关的概念包括地方感、地方依恋(Williams and Roggenbuck, 1989)、地方依赖(Gibbons and Ruddell, 1995)等。地理学者亦从多个视角对地方认同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在中外相关数据库中进行关键词检索,发现自1999年起,国内以地方认同为关键词的研究数量偏少(附录A—1),特别没有检索到将节庆与地方认同同时作为关键词的研究。而对英文文献的检索结果显示,已有几十项研究在节庆、节事或民俗节庆背景下探讨地方认同(附录A—2)。事实上,在日常文献积累与阅读中,确实发现国内有少数几篇有关民俗或节庆的研究涉及地方认同概念,成为本文的重要参考文献。地方认同将个人身份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概念,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观点、信念、偏好、感觉、价值观和目标,以及行为

倾向和技能等(Proshansky,1978)。但是,环境心理学在研究地方依恋及其相关概念时对地方本身的特性关注不足(Lewicka,2011)。地方认同受外部力量与本地因素交互作用,在时空维度上具有动态建构性(Said,1994),地方在人文地理的语境中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意象(朱竑、钱俊希和陈晓亮,2010),但是地方概念中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地方内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空间组织正发生激烈的变革,社会各类群体都积极地参与到各类社会空间的建构中,并由此生产出地方的文化意义,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地涉及政治权利关系与权利斗争(朱竑、钱俊希和封丹,2010)。基于地方性文化意义的社会文化再建构越来越多地被人文地理学者所关注,而地方性意义和地方认同可能由居民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等共同建构(Borer,2010)。节庆常常被视为地方营销的工具和城市再定位的策略。然而节庆是否会丧失其地方性成为地理学者讨论的重要议题。本书理论意义在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入手,以广州城市民俗节庆为例,探讨不同行动者在民俗节庆中所拥有的权力及相应的权力关系,揭示谁拥有文化表征权力,谁的文化记忆和传统得以展现,由此建构出何种的地方认同,从而透析在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变化背景下,地方性与地方认同再生产过程中的政治与权力关系,并比较分析不同民俗节庆地方认同建构过程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的原因何在等话题。

二、实践意义

面对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等现实冲击,从国家到地方均开始关注地方性文化的挖掘与重构。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

民政部和文化部于 2005 年 6 月 17 日发出文件要求重视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充分认可了传统民族节日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中的作用^①。广东省自 2002 年即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强调重视本土岭南文化以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②。2008 年 11 月,广东省政府部门首次组织专家学者对广府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共广东佛山市委宣传部则在广东南海召开了广府文化研讨会,2009 年 12 月 28 日首个省属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在佛山挂牌成立^③。面临经济全球化,城市经济的发展、物质环境的改造与变迁等对广府文化本身造成了很大冲击,特别是原有的粤式生活方式日益淡化,广府文化的表现形式日渐模糊,广府文化的重要遗产日渐式微甚至有消亡的危险。作为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中心,广州在挖掘地方性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将广府文化研究提上日程,于 2012 年 2 月正式挂牌成立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同时,广州作为多元文化中心,其文化建设目标为“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名城、具有高度文化认同的首善之区”^④。正如历史学家、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说:“我们面临的困难包括市民的文化认同和现代市民意识有待于提高。广州市民较为讲究平时的生活,比较讲究日常生活的舒适,对超越生活经验的抽象思辨比较缺乏兴趣,有时他们在言谈举止间容易给不了解岭南文化的外来人以没有文化的感觉。广州每年都要接收许许多多从外省来的

① <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50623/102090.shtml>。

② http://theory.southcn.com/c/2004-02/09/content_12312028.htm。

③ http://news.dayoo.com/foshan/201002/02/73490_100854915.htm。

④ <http://nf.nfdaily.cn/epaper/nfds/content/20110325/ArticleA204002FM.htm>。

新居民,新移民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认同感和现代市民意识的提升,(这)也是文化建设的瓶颈之一。此外,文化资源破坏性建设的局面有待改变。”^①民俗节庆的复兴和繁荣被当作良方试图促进地方认同的建构、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文化融合。

然而,打着广府旗帜的城市民俗节庆中,不同行动者如何借助其所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书写他们所理解的广府文化?如何建构独特的地方感与地方认同?这是一个充满协商与争议的过程。探讨这一过程将有助于传承广府文化、树立基于广府的地方认同,并一定程度上增强地方不同群体对地方文化的骄傲感、归属感、认同感等,因此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一、研究创新

研究视角上,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探讨了城市民俗节庆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是节事与新文化地理研究的有益交叉,弥补了以往节事研究较多关注节事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较少深入探讨文化过程的缺憾。同时,深入探讨了不同行动者如何运用其所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参与地方认同建构的过程,是从政治地理学视角探讨文化、权力与地方认同建构的有益尝试。

理论对话上,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城市传统民

^① <http://nf.nfdaily.cn/epaper/nfds/content/20110325/ArticelA204002FM.htm>。

俗节庆·新创民俗节庆与复兴民俗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地方性认知是地方认同建构差异的主要原因,这是对新文化地理学地方性与地方认同理论的新发展。

在中国多元一体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传统民俗跨地方传播在消解一种地方性的同时,也使得另一种地方性得以重建。而一地地方性常常是多尺度地方性的综合体现。就此意义而言,本文是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对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理论的新探索。

二、研究不足

本文尽管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笔者深知,这仍是一个有待继续努力的研究。从新文化地理视角来关注城市民俗节庆中地方认同的建构问题,并选择迎春花市、广府庙会和龙舟节三个案例做深入研究,并不能反映广府民俗节庆的全貌。今后可拓展至广府地区其他民俗节庆活动,以便全面理解全球化时空背景下、多元历史文化现实的城市地方认同的建构。事实上,广府地区除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民族传统节庆外,民间诞会也非常兴盛:农历正月的生菜会,二月的土地诞、波罗诞,三月三北帝诞,四月金花诞,五月龙母诞,六月鲁班先师诞,七月白云诞,八月日娘诞,十月下元诞等,各具特色。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引入的西方情人节、愚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平安夜、圣诞节等全球尺度的节庆活动也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年青一代。这为今后探讨全球化时空背景下、多元历史文化现实的城市地方认同建构提供了研究机会。因广府庙会是新创节庆,其未来走向如何尚不明确,故所得出的部分结论尚需时间检验,但这恰好也为今后继续展开历时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尽管本文尝试分析城市民俗节

庆中的权力关系,但是由于不同行动者并未采取激烈的行动抵抗实践,因此本文仅仅基于话语对这一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和象征性抵抗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未对权力本身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这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和探讨。此外,今后研究亦可进一步讨论全球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冲击了工具性的地方依赖、生活习惯性的地方依恋抑或是社会资本积累等。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新文化地理学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地理系教授彼得·杰克逊是新文化地理学的倡导人之一,他首先提出了文化研究应关注文化政治、关注空间和地方在建立意义地图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他将地理视为文化建构过程的基底性因素(Jackson,1989)。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认为文化不仅是代际传承的,同时文化也渗透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特别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异质、多元甚至相互竞争的话语间冲突不断,语言、知识和社会实践等均在意义建构中发挥着独特的价值(Mitchell,2000)。文化景观的变化与相应的权力关系紧密相关,不同群体通过权力斗争来争夺空间的意义(Jackson,1989),甚至引发文化战争(Mitchell,2000)。文化地理学家们非常重视文化的多样性并将关注焦点转向探索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重点分析文化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其中地方性文化和社会实践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方面。

第一节 地方认同建构的文化政治

20 世纪 70 年代,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者将“地方”重新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由此地方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两大核心概念之一(周尚意,2011),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以及地方之

于人的文化意义成为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面。地方感、地方认同、地方依恋、地方依赖等概念均受到大量关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Tuan, 2001), 强调人类地方体验的主观性, 视地方为“感知的价值中心”, 认为地方是稳定的、有界限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实体(Tuan, 1975)。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激进学派却认为, 地方并不只是与正面的地方依恋和根植感有关, 它们总是与权力有关的(Keith and Pile, 1993), 地方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成为建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地理媒介(朱竑、钱俊希和封丹, 2010), 与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皆密切相关。在全球化技术推进的社会背景下, 简·雅各布斯指出, 城市日益成为“无意义的地方”(Jacobs et al., 1987), 传统的基于地方的社会关系呈现“去地方化”(non-place/placelessness)的趋势(Auge, 1995; Arefi, 1999; Briekeland, 2008)。但马西(1995)却认为, 地方并非与它的过去完全割裂, 也从未失去与其他地方的联系, 它总是处于特定的时空范围并由其所处的内外社会联系建构而成。所谓“地方独特性”也总是“超越地方”的“全球”广泛联系的产物, 而并非像内在论者和本质主义者所持有的僵化、一成不变的地方观点。关于全球与地方的争论催生了城市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外来文化的融合、本土化等新的研究话题(朱竑、封丹和王彬, 2008)。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 地方与全球相伴相生(林耿和王炼军, 2011; Schnell, 2007; Lam, 2010), 地方文化强盛的生命力使得其地方性不可能被根除(刘建明, 2005; Lewicka, 2011)。事实上, 从地理学者们开始将“地方”视为一个概念来探讨起, 关于地方的思考与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Relph, 1976; Arefi, 1999; Relph, 2000)。地方、无地方、

去地方等领域的探讨就成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但随着时间和地方的变化,需要重新看待地方的意义及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

一、地方性建构地方认同

与社会认同的概念相对应,地方认同延伸至客体和事物乃至空间和地方,指个人或群体经由地方互动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它经过情感、感知与认知等多种复杂的过程,个人与群体将自身界定为某个特定地方的一分子(Stedman,2002),通过地方来构建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角色(Proshansky, Fabian and Kaminoff, 1983)。在这一语境下,地方是人类活动发生的地理背景,亦成为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Krupat,1983)。换言之,地方认同成为个人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根据特定地方的独特要素、人地互动的本质而发展出来的(Bernardo and Palma,2005)。人与地方互动的过程中,保留了许多与地方有关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这就赋予地方独一无二的意义,成为人们识别地方的重要依据,并促进了地方认同的实现(Twigger-Ross and Uzzell,1996)。这为探讨地方性与地方认同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探析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需要以理解地方性为基础。在与地方长期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该地区区别于他地区的深层文化传统,并且当该地人们认同这些长期积累的文化时,可以认为这构成该地的地方性(周尚意、杨鸿雁和孔翔,2011)。特定地方运用各种策略、逻辑与知识建构出本地独特的“地方感”,并使得其成为外乡人得以识别该地方的独特性(朱浒,2005)。地方性是社会生活的现象学特质,也是一种情感结构(阿帕杜莱,2012)。概言之,一个地方需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原生性、实践性等特点的地方文化